

论夏衍的人文关怀

陈 坚

(浙江大学 中文系,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 人文关怀作为作家宏观的、以人为中心考察社会问题的本质态度,在夏衍剧作中,表现为对广大底层百姓生存问题的关切,对创作主体身处当下的时代精神问题:民族意识、女性意识、科学与人类的关系作出的富有前瞻意义的价值判断;同时,夏衍有关人性本质的揭示并非静态的,而是具有与时代主流紧密相联的实践品格。

[关键词] 夏衍剧作;人文关怀;实践品格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1)01-0014-08

A Study of Xia Yan's Humanistic Concern

CHEN Ji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Humanistic concern as a general attitude of a writer toward his social descriptions has displayed itself in Xia Yan's plays in the form of a sympathy with the life of the general and especially the lower public as well as the general social outlooks of his time including national and feminine consciousness, the relation between Man and science. Xia Yan's exploration of the human nature is not static but a with dynamic practical character of the main stream of his time.

Key words: Xia Yan's plays; humanistic concern; practical character

英国史学家阿伦·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中说：“艺术与人文主义有着一种特殊的血缘关系”；“通过文学、戏剧、演讲、歌曲进行交往的力量，是人文主义传统中最核心的东西^[1]”。此话证之夏衍，极为恰切。当艺术家夏衍着笔构建他的艺术世界的时候，他是十分自觉地以独特的人文关怀来评判与经营各种素材的。他的人文关怀实质构成了其艺术创造的根本的原动力。正因为如此，夏衍的创作虽本于抗战前后的现实生活，有着时代背景的规定性，但从中表现出的毋庸置疑的真实和思想穿透力，却使得这些作品具有了一种非同寻常的艺术力量，这种艺术力量往往还因而具有一种超前性和广延性。在作品甫发表的当时，其真正内涵往往还不能为许多人所接受，甚至要遭受非难（《芳草天涯》在陪都重庆受到的批判即为一例）。但时间的流逝终究可以说明一切。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我们虽已离黑暗的20世纪30年代、40年代早已久远，也早已不闻抗战的隆隆炮声，但重新阅读夏衍作品却时时不免为之吸引和共鸣的根本原因之一吧！

—

人文关怀、人文主义、终极关怀等等，都是时下颇为流行、意颇相近但也各有差异的名词。其共通的一点是以人为焦点，以人的经验作为对自己、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我们这里谈到的人文关怀，指的是作家宏观上自觉地以人为中心来考察问题的本质态度。也即作家有一种明确意识，围

绕着他笔下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以自己对人物生活的体验为基础,展开对人的存在的各种复杂关系的探寻,从而完成其艺术描写和审美创造。在写作过程中,作家有关自然、生命、社会、历史各方面的本体性思考,都是和人的生存、现实的人的生命这个核心问题自然而紧密地结合起来展示的。

以此来观照夏衍的剧作,可以发现,他的人文关怀首先就表现在质朴而强烈的人道主义感情上。也许我们可以说,在左翼作家群中,如此旗帜鲜明地高举人道主义大旗的,惟夏衍一人而已。夏衍当年有一篇《于伶小论》,曾很精妙地评论了于伶剧作所包孕的人道主义感情,这不妨看作他的夫子自道:“最触目,最感人,也是我们这位作家所最值得珍爱的,是他洋溢着的人道主义。人道主义使他同情弱者,人道主义使他憎恶强暴,人道主义使他带着不愉快的心情来正视现实,也是人道主义,使他从现实社会的矛盾苦恼,怀疑追索而走向了学习一种可以解决一切苦恼和矛盾的理论。于是,一个诚实而单纯的青年求神者,发现了新的神,发现他灵魂的新的支撑点了。”^[2]

夏衍式的人道主义或者说人文精神,最本质也是最基础的一点,就是对广大底层人民生存问题的关切。所谓人的问题,说白了,都必须以“活着”为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一切都是空洞玄虚的。夏衍自己“从小吃过苦,亲身经历过农村破产的悲剧,也饱受过有钱人的欺侮和奚落”^[3],深知在那一种社会条件里,一般贫困百姓要艰难求生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因此,他在他的作品中就不能不倾心地描写这些人平淡而灰黯的人生,不能不打心眼里同情他们为艰难求生而做出看似卑微细琐却性命交关的生存努力;而面对这一切,他更不能不以十分宽容的心态予以体认:对大多数人来说,在这种社会条件里,怎样才能活下去终究是生命最紧要的问题。

在《上海屋檐下》中,当革命者匡复九死一生回到家中,竟然发现自己的爱妻杨彩玉与好友林志成同居了。三个人一时间陷入了巨大的矛盾痛苦中。爱情、忠贞、信义、良知等一系列复杂的人类重大情感问题瞬间就被交织呈现在舞台上,炽热紧张的舞台气氛似乎立刻就要爆炸了。然而,这时夏衍耐人寻味地点出了“生活——生存”问题,而这一问题立刻就让人们感到了那最基本的人生问题超乎一切的分量。当然,人们与此同时也就感到了一种巨大的忧伤:毕竟杨彩玉、林志成并不甘心于如此虫豸般地辛苦生活,他们也有追求,也懂得什么叫爱情、信义这类高尚的人类精神问题,可现实人生让他们别无选择。林志成面对匡复曾自辩:“自我接到你从龙华辗转托人带给我的信,我就去找彩玉,跟你想像的一样,那时候,他们潦倒在一家阁楼上,你家里的一切,差不多全在你出事的时候给拿去啦。我……我尽我的力量招呼她们,可是,一年,两年,得不到你一点儿消息,跟你同案子的人,死的死啦,变的变啦,足足的等了你三年,简直不知道你死了还是活着……”^[4]而杨彩玉直面匡复时,就把问题说得更直接明确了:“但是,在责备我之前,你得想像一下,这十年来的生活!我跟你结婚之后,就不曾过过一日平安的生活,贫穷,逃避,隔绝了一切朋友和亲戚。那时候,可以说,为着你的理想,为着大多数人的将来,我只是忍耐,忍耐……可是你进去之后,你的朋友,谁也找不到,即使找到了,尽管嘴里不说,态度上一看就知道,只怕我连累他们。好啦,我是匡复的妻子,我得自个活下去,我打定了主意,找职业吧,可是葆珍缠在身边。那时候她才五岁,什么门路都走遍,什么方法都想尽啦,你想,有人肯花钱用一个带小孩的女人吗?在柏油路粘脚底的热天,葆珍跟着我在街上走,起初,走了不多路就喊脚痛,可是,日子久了,当我问她:‘葆珍,还能走吗’的时候,她会笑着跟我说:‘妈!我走惯啦,一点也不累’。……(禁不住哭了)这是——生活”^[5]。

“生活”听起来很轻松,可在现实里,它的的确确是那么沉重。听了杨彩玉的这番自白,原来颇愤愤然的、话多讥讽的匡复也只能说:“彩玉,我一点也没责备你的意思”。

正是基于对“生活”的如是理解与诠释,基于对非人的黑暗制度下人的求生意志的高度尊重,夏衍才在《都会的一角》中对舞女张曼曼,《中秋月》中对李曼娜,《赛金花》中对赛金花,《上海屋檐下》对匡复、林志成、杨彩玉、黄家楣、赵振宇、施小宝、李陵碑,《娼妇》中对娼妇以及《复活》(改编)中的玛丝洛娃……等等角色表现出如此深厚的同情与怜惜。也许,换一个角度,这些人物都有颇可加以

批评之处的,也许,这些人的生活的确“没有传奇,没有光彩”,但是无可争议的却是,他们同样有要求继续生存下去的权利!现代人道主义精神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尊重每一个个体的生命价值,尊重每一个生命的生存努力。夏衍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表达出其剧作的基本价值倾向和审美情感的。他心平气和地将自己也同样置入四周的小市民及不见经传的无名无姓之辈中,从“人人的日常生活”中,“一直理会到他们的灵魂”^[6]。尽管对这种生存状态决计谈不上满意,并对此种状态抱有相当严厉的批评态度,但他的这种批判也不是居高临下式的,而是真切的,平等的,同时还饱含着泪水。这也是夏衍作品感人力量的源泉所在。在现代作家中,关心底层人民生存状态、关怀人的基本命运者,为数本来不少。但像夏衍这样,自觉而坚决地把握住人文精神这一根本的,实不多见。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夏衍决不是一位泛人道主义者。马克思早就说过:“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7]。就现实的、具体的人来说,虽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束缚,但他们理当具备“自由自觉的活动”的充分条件与主体意志。不然,他们的活动就不能认为是符合“人类的特征”的。作为一位坚定的革命者,对于马克思主义这方面的真精神,夏衍是有着独特而深刻的理解的。他的确真诚地同情着他笔下的各色底层人物,并关注他们的灰黯生活,从心灵深处感觉他们的无奈与疲乏。但在另一方面,他决不认同这样的生活,绝不以为这种生活是合理的、必然的。所以,他不但真实地写出了笔下人物琐细灰色的生活,更在意由此写出各色人物局限于这种琐屑生活的烦恼与苦闷,写出那些“充满了人世坎坷的喜怒哀乐的精神存在。愚昧、愿实、哀怨、失望、堕落、欺凌、忍受、反常、幻灭,来去交错,引人发笑,起人哀感”^[6]。而这样做,用夏衍自己的话来说,他就能将每个人物“身受着内内外外的、精神和物质的对于人性的真和美的迫害和戕杀”^[2]痛烈而细腻地表达出来。这是夏衍的人文精神真髓所在,是其作品人道主义力量超越泛人道论者“爬行式的人道主义”(借梅耶荷德语)的关键。

夏衍十分重视人物精神状态的描写。像《都会的一角》中那舞女内心的焦灼和不安定感,《中秋月》中李曼娜的抑郁与苦恼,虽只是初试啼啼之作,但已写得异常逼真。当然《上海屋檐下》里对有关人物的刻画更是精妙传神。通过舞台人物言简意赅的对话,夏衍不但精细入微地表现了他们的生活原生态,同时也呈现了他们精神活动的底蕴。譬如林志成这个人物,一出场就让人感觉他脾气急躁,精神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但这是为生计所迫的紧张,是底层小人物一种无可逃脱的宿命。杨彩玉是这么评论他的:“他在厂里不结人缘,受人欺负,被人当作开玩笑的对象。他的后辈一个个地做了他的上司。整天担忧着饭碗会被打破,回到家里来,把外面受来的气加倍地发泄在我的身上,一点儿不对,嘟着嘴不讲话,三天五天做哑巴”^[4]。而林志成对自己的苦闷有着更深一层的体验。在匡复返家后,他受到一种莫名的激励,挣脱了多年来艰苦生活加在他身上的患得患失的枷锁,与可恶的老板决裂了。他告诉匡复:“今天真痛快,我从一方面受人欺负,一方面又得欺负人的那种生活里解放出来啦!(大声)我打破了饭碗。可是从今以后,我可以不必对不住自己良心去欺负别人啦!”^[4]这里,夏衍明确点出,不公平社会里的不公平的人与人之间的地位关系,那一系列人欺负(压迫)人的事实,是人们苦痛的真正根源。何止一个林志成,《上海屋檐下》剧中的每一个人,赵振宇、赵妻、黄家楣、桂芬,乃至李陵碑、施小宝,他们的痛苦又何尝仅仅只是因为逼仄的物质生活?是因为那不公平的社会制度所编就的那张大网,令他们无从挣扎,无从逃遁。在这一张大网中,底层人物如黄氏夫妇就不免终日拌嘴,而赵妻竟猥琐地以贪小便宜为乐了。

夏衍就是这样,通过对笔下人物精神苦闷现象的描绘及根源的挖掘,不仅使人们从最深层的人类普遍情感上来同情每一个生命个体,而且还教人以生存智慧,使人自觉地对自身的生存状态做一个明确的反省,如《上海屋檐下》中的林志成和匡复、《复活》中的玛丝洛娃和聂赫留道夫、《芳草天涯》中的尚志恢和孟小云那样。这使得人们在认识自己的同时,对社会也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因此,可以这么说,夏衍的人文关怀已达到了超越事物表象直接本体,也就是对什么是“人的自由自觉

活动”，人类如何才能“自由自觉活动”进行诠释的高度。虽然在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夏衍不可能把他这一层意念明显表达出来，但《上海屋檐下》剧中，林志成、匡复、杨彩玉灵魂上的涅槃，葆珍那稚嫩却生气勃勃的声音，已经分明透露出这样的消息了。

二

作为一位杰出的艺术家，夏衍的人文关怀总是全方位、多层次的。他不但对那些关于人类存在的本质问题发表意见，更直面自己身处当下的时代精神问题，适时地、勇敢地、富有前瞻意义地作出价值判断。“只有具备着全副心肠的深而且广的人道主义的知识分子作家，才能不沉溺于自己狭隘的情操，才能使自己眼、心、脑看到感到和想到更广泛的地方，才能成为一个真实的社会人和世界人^[2]”。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夏衍的人文关怀是真实的、鲜活的，让人们感到它与自己的生存真正是息息相关的。

这里，我们主要就民族意识、女性意识及科学与人类关系这三方面的问题来讨论夏衍人文关怀的时代特征及相关的艺术表现。笔者认为，这几个方面的表现不但是夏衍剧作的主题，而且，他在这几个方面所展现的艺术概括能力与思想深度，至今熠熠放光，锋利无比。

首先要谈到的是民族意识问题。夏衍一生创作了18个舞台剧本（含与人合写的《戏剧春秋》），除却解放后的两个作品，其余的基本上直接、间接与“保卫中华，爱我中华”这个题旨有关。这也是很自然的。夏衍所身处的那个时代，外有强敌侵袭，内有国贼作祟，整个中国简直无一安宁之日，无一守安宁之土了。“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8]”。对此一点，夏衍是有切肤之痛的。不用多说，爱人类，首先就要热爱自己的国家，尽力维护自己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因而，夏衍将最愤怒的火焰射向了那些使中国这么一个泱泱大国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那些腐败的统治者，以及那孳养这些败类的旧社会体制。他的成名作《赛金花》就是这么一把刺向黑暗社会的匕首。剧中写到，慈禧太后本想利用义和拳来排洋，不料惹来了八国联军。面对洋枪洋炮，满清官僚上上下下，一筹莫展，丑态百出，或是嚷嚷“奴才会叩头，跟洋大人叩头”，或是“念书之外什么也不会”，或者“都抽鸦片烟，不给烟，已经差不多快要死啦”，或像“猴儿似的”被牵来牵去。只有李鸿章还算是有办法的。他的法术是说服妓女赛金花去做“西施和昭君”。《赛金花》的讽刺对象是很明显的。在这一幅官场百丑图中，人们可以看到所谓的国民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绝对不抵抗”政策与清王朝“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是何其神似。正因为贴住了国人的心灵，宣泄了时代的精神苦闷，《赛金花》一发表便引起了轰动，而国民党政府对此则大为光火，不久即予以查禁。

有关爱国主题的挖掘，夏衍更着重的是这个问题与每个中华儿女的密切相关特性。爱国，拯救民族危亡，似乎是很大的问题，是大人物或是仁人志士所关心的事。但夏衍提出，只要是中国人，无论他地位高低，身份如何，身处什么地域，这国家大事就会随形附影，与他的日常生活紧紧系结在一体，须臾不能分离。比如《都会的一角》中的小弟弟念地理课本会触及东三省沦陷，而《一年间》中只想着刘家传宗接代“大事”的刘绣笙到最后也要关心天上飞的是不是“中国飞机”了。当然，有关这方面最有艺术感染力的莫过于俞实夫这个形象的塑造。俞实夫是正直的学者，也有很强的爱国心，但他固执地将家国问题视为一个单纯的政治问题，想把它与自己钟爱的科学研究截然分开，于是不免在现实中大碰钉子。东京、上海、香港、桂林，一路颠簸，连安定的生活都不可能，哪还谈得上科研呢？当钱裕这个风华正茂的青年被法西斯枪杀在他面前之后，俞实夫最后转变思想，发出“在大家共同的立场上，为我们的国家，为人类，尽一点力量”的呼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因为是中国人的事情就不能不与之休戚相关;因为是中国人的困难当头之际就不能不挺身而出;因为是中国人的热爱中国与痛恨外侮就同样是无条件的。在《法西斯细菌》、《水乡吟》、《一年间》、《愁城记》、《离离草》、《心防》、《芳草天涯》等剧中,夏衍就这么切实有力地向我们阐明了这一朴素的真理。值得一提的是,夏衍的民族意识还充满了现代意识和人道主义的情怀。这突出表现在他在剧中虽然鼓励、激发我们的爱国情怀,但并不因此而鼓吹狭隘的民族主义,并不因此贬低别的民族自身的存在价值。在《冬夜》中,他写到了战争给日本民族带来的巨大痛苦;在《法西斯细菌》中,他还塑造了静子这么一位可亲可敬的日本女子形象。这不是例行的政治说教,而是表明了他的基本思想和立场。他是站在维护全人类利益的高度来反对这场战争的,因为这场战争只能给一般平民百姓带来苦难;同时,他也是从人类善良的感情愿望出发来爱自己的国家、民族的,不但因为自己的国家、民族正处在抗击人类公敌的第一线,而且也因为一个连生养他的家国都不爱的人,是很难奢望他爱全人类的。夏衍的这种态度,不但远远超出了中国近代史上出现过的“驱除鞑虏”的狭隘民族观,更足以引起今天某种标举“天下主义”、“全球主义”的数典忘祖者的警戒。

以现代的人文意识来看待女性问题,关注女性问题,是夏衍剧作的另一大重要内容。早在20年代夏衍初涉文坛,刚刚开始参加革命工作,妇女解放问题就受到了他的关注。的确,一个性别去压迫另一个性别这种现象,就像有权有势阶级压迫无权无势阶级一样,是不公平的,是现代文明人的耻辱。然而,两性问题又是人类存在的一个最基本问题,许多妇女问题的存在,不但有现实的近因,更有历史的远因。女子也能上学,给缠足妇女放脚,这类问题比较明显,也较容易解决,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如妇女的独立人格、平等地位,在现实中就比较难以改变了。这不仅牵涉到现实生存的惯性与惰性,也牵涉到人们(包括女性自己)的意识深处因男性权力话语中心催眠而对许多男女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习焉不察的问题。应当承认,夏衍在这方面的开掘要比现代许多剧作家深刻得多,也更显时代特色。

如果说夏衍的处女作《都会的一角》、《中秋月》还只是为底层女性的生活奉上一掬同情之泪,那么,他在《秋瑾传》中,则已注意到了女性参与国家政治、社会活动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夏衍塑造秋瑾这个形象时,是有意强调了秋瑾身为女性在这方面追求平等的自觉意识的。对《赛金花》中的赛金花历来争议较多,这个人物自然不能视为是妇女解放的代表,但夏衍将这个人物写得很活脱:虽堕落风尘,随波逐流,却又天良不灭,在一个古怪而奇特的历史场合,居然干出了大事情。这里,与其说夏衍赞赏赛金花,还不如说他是表达了这样一种期冀:希望这类女子能够在可能的条件下,自觉地作出一些符合良知的决定。倘若能做到这一点,她在人格上与常人就是平等的,甚至高过许多人。在《上海屋檐下》,夏衍通过杨彩玉这个形象的塑造,深入触及了女性的婚姻与生活问题。因为他的确做到了从男女平等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因此,杨彩玉的屈服了生活,就不是那么让人不可接受了,而她的形象甚至还是有几分可爱的——按照常人的心理,妻子不忠总比丈夫不忠更难以接受些。

在此我们重点讨论的是《芳草天涯》。不但因为它在历史上遭受过不公正的待遇,直到今天仍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更因为这部作品在艺术上和思想内容上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从女性意识这个角度来看,该剧深刻地揭示了女性的自我异化问题。剧中的石咏芬早年也是一位时代女性,嫁给尚志恢,琴瑟和谐,被人称为“是一位合乎现代标准的文化工作者的太太”。可婚后她开始变得无所用心,日见庸俗。最让尚志恢不能忍受的,是她颐指气使却毫无自知之明,对于夫妻的情感生活全无感应。而石咏芬的悲剧也正在这里,她是完全地从麻木的生活状态来看待眼前这一切的,在骨子里她已彻彻底底地归化了传统观念中的“相夫教子”,因而,怎么都不能理解尚志恢站在现代人文意识的立场去要求石咏芬要有自己的灵魂、自己的情感。当然,夏衍的笔触并未停驻于此,他还从两性共同生活关系进一步挖掘了石咏芬悲剧的现实根源,即尚志恢本人也是此悲剧的始作俑者。

尚志恢尽管在感情生活中对石咏芬有这样那样的要求,但在具体家务上,则是中国旧男人的典型,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油瓶倒了也不会伸手去扶的。剧本第二幕开场一段是尚志恢生活方式的典型写照,这样的人如何叫石咏芬从那纷乱如麻的家务中抽出闲心来与他共享情感生活呢?生活毕竟是现实的,要从点点滴滴的、平俗的日常事务做起。依尚志恢的做派,即使当真娶了孟小云;“这样洋溢着生命力量的少女”也不免会成为石咏芬第二。这样,夏衍也就写出了许多高蹈派的中国男性知识分子的两难:一方面,要领略欣赏女方作为独立个体的活的灵性,另一方面,又想维持旧的生活方式。

夏衍这样的描写,可谓是从思想根底上及现实存在上发现了中国女性解放问题的一个大病灶。这病灶是如此的根深蒂固,积重难返,简直让人找不到什么药到病除的方法。不过,也许正因为如此,他的确找到了病根,这病根深扎于每个国人的骨髓里,在经受了 he 犀利的手术刀解剖后,每个人还要以现代男女平等意识不断培元固本,这病灶才有治愈的可能。现代文学史上,对这类问题揭示得最为深刻的是鲁迅的小说《伤逝》,以作者的私见,夏衍的《芳草天涯》是可以与之媲美的。

夏衍的人文关怀还体现在对科学问题的思考上。近代中国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如何改变这种情况呢?中国知识分子走过了一段颇为曲折的心路历程。从较肤浅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一直到本世纪初,终于有人喊出了“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口号。这些口号的思想实质归根结底,都可以归结为这样的理解:中国落后于人,主要是因为科学不发达,只要科学发达了,中国的问题也就解决了^[9]。事实上,夏衍早年也有这种惟科学主义的倾向。但在漫长的革命求索道路中,夏衍意识到这种思想的虚幻性与危害性。在《法西斯细菌》中,他通过俞实夫这个形像的塑造,给了人们以活生生的教训。

对于俞实夫这么一位诚实而不免迂阔的知识分子来说,要他放弃自己的信仰有时真是比夺其性命还要难。但夏衍真实细致地写出了他“只问科学,不问政治”的心理如何发生根本性转折的曲折微妙的过程。大言炎炎的赵安涛的高论,对他不能说是没有影响的,可他觉得那只能算是聊备一说而已。到中日彻底交恶,环境日益恶化,连家里的佣人都因为静子夫人的关系辞职,钱裕又跟他说起真纳教授的《比诗还真实》时,他是确实有所触动了。他至少感受到,科学固然能解决某些问题,但决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尤其当某种反人类的意识(例如法西斯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而钱裕被日本兵的惨杀,则从根子上给了他的原有信仰以致命的一击。“一路上来,我一闭上眼,好像就看见阿裕那双老是望着我的善良的眼睛……也好像看见了那些日本兵的发了疯的嘴脸……^[5]他痛彻肺腑地体认到了科学无能的那一面。科学可以解决许多人类物质生活上的问题,对人类意识、精神构成却常常是软弱无力的。医学家可以给一个人以强健的体魄,却对其精神的健康与否不能有什么作为。最终,俞实夫毅然决定暂时放弃医学研究而去红十字会医院,这是一种灵魂的升华:是一个中国人的良心使然,更是一位科学家对科学功能有了深刻认识之后的理性抉择。

夏衍是20世纪中国少数对于科学负面作用有着清醒认识的作家。科学是中性的,可济善也可恶。在《法西斯细菌》中,夏衍就提到过俞实夫所从事的伤寒菌研究,在日本却正有人用作细菌战。有关此一问题的表述,最精辟的还见诸于1945年8月在广岛原子弹爆炸之后,夏衍为《新华日报》写的社评《从原子弹所想起的》。他在文章中指出:“把这种‘能’(指原子能——引者注)应用于建设性的动力及和平工业生产的时候,人类文明必须会有划时代的改进,可是在今天,不幸这个足以影响人类历史的重大文明,却初试锋芒于杀人盈万的战争中了!”他大声呼吁:“战争的目标是打击日本帝国主义,而不是日本人民。……科学的成就应该有助于人类,而不是毁灭人类^[9]。”

原子弹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在这之前,人们理解科学,一般只从造福于人这方面加以考虑。但原子弹的出现,使人们认识到科学是一柄双刃剑,科技的进步还意味着人类已经掌握了毁灭自己的方法,对这个问题予以怎样的重视都不为过。这也是二战以后,一大批伟

大科学家如爱因斯坦、奥本海默、鲍林等纷纷成为坚决反核的和平主义战士的原因。因此,不夸张地说,夏衍这方面的水平就当时思想界而论,是超前的,也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

三

马克思主义在有关“人”的问题上,是有着极丰富的思想资源的,有论者指出,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的理论不是别的,它就是关于人的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学说”。当然,与西方其他有关学说相比,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关怀已不再仅停留在伦理的范围内,而是从整个历史观上对人的自由和解放给予了说明^{〔10〕}”。因此,马克思主义也就超越了人类以往一切的有关人的学说,它向人们指明,“人类决不是像加缪所描写的西西弗那样,终生荒谬,终生苦难。人类有解脱悲剧的法宝——实践,惟有马克思‘实践的人道主义’能给人类和历史以新生^{〔10〕}”。

通过对夏衍剧作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他的确在精髓上捕捉到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关键:实践。在他的作品中,对有关人性本质的揭示与描写从来不是静态的。也就是说,夏衍并不从激变的时代中疏离出来,也不对人的某些情感片断把玩不已。他从不像有些作家那样,只写笔下人物的狭隘悲欢,以为这便是世界的全部。他尽力做到通过描写人物的实践过程——不只是社会实践,更是他们作为主体意志的人的生命实践,从而多侧面地写出他们的精神、思想情感方面的起伏、转折、变化。或者可以这样解释夏衍以实践为中轴的人文关怀:他是以人作为中心来考察问题的,但这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确确实实与各种外在关系发生纠葛的人,或者说,人的实际定位就在与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产生,而艺术家夏衍则着重把握那人在与外界打交道过程中的主体意志及两者相互作用的关系,这也就是人的实践本性问题。因此,夏衍对人的把握,不会像一些机械论者那样,只重视物的因素,而忽视了艺术的根本,忽视了对千差万别、多彩多姿的个体生命的关怀,也不会像旧人文主义者那样,老是摆脱不了自怨自艾、顾影自怜的情调。

具体地说,夏衍人文关怀的实践品格,在以下两个方面凸现得比较鲜明:一是永远紧跟时代主潮;二是永远强调人的自我超越精神。

先说夏衍对于时代主潮的把握。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人的实践本性首先就体现在他与时代主潮之间的顺应关系。夏衍在创作中很重视描写人的个体生活与时代大潮之间的关联。像《上海屋檐下》中匡复、林志成、杨彩玉三人的纠葛,看似很难理清,但匡复一旦认识到了国家存亡的危急时刻,一个人实在不能在这种永远缠绕不清的情感关系中作太多纠缠,便毅然挥慧剑斩情丝,走向了新的生活。而俞实夫放弃自己的伤寒细菌研究,其实也是一个顺应时代大势的过程。值得一提的是《考验》这部作品,这是夏衍建国后惟一一部多幕剧,他本人对之很不满意,后来几乎提都不愿提起。不过这部剧作其实也还是有其优点的,尤其在顺应时代主潮这个问题的诠释上。夏衍在剧中向人们揭示出的所谓时代主潮,是常常会发生变化的,随着具体情势不同,它的流向就会不同。因此,共产党人对此亦绝不可掉以轻心,不能以为自己曾经得过风气之先,就可以一辈子稳吃老本了。比如剧中的杨仲安,在战争期间是一位优秀的战士,但到了建设时期却放松了对自己的改造要求,只懂得将打仗一套搬到工厂中。“工厂就是战场,让我们大家努力,用主人公的态度,坚决地完成上级交下来的任务^{〔5〕}”。而对现代企业的民主、科学则不思进取,做政治工作是“我打你通”,“我说你服^{〔5〕}”。结果在工作中遭到了重大失败。《考验》发表于1954年,在当时,夏衍就如此尖锐地从根子上挖掘出了某些时任领导干部的共产党人跟不上时代步伐的原因,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不但需要睿智,更需要艺术家的良知与勇气。可惜的是,他的呼声太弱小了,被淹没在人声鼎沸的“歌德”声中,结果,他在剧中的忧虑后来竟成了谏言。

不过,在解释人与时代大潮的关系时,夏衍的艺术把握并不是无可挑剔的。最重要的一点表现在夏衍较少从个体一方去看待个体与时代大潮的矛盾。他总是理性地以为,当人们认识到问题所在后,就会自觉地去服膺自己的理性认识。但人性的复杂却在于理性在与情感、非理性的争斗中,常常是不占上风的。因此,夏衍处理这方面问题有时就不免失之简单和粗糙。比如《芳草天涯》的结果不但与《上海屋檐下》有些雷同,而且更不可信,剧中的矛盾并未得到真正的解决,有点草草收场的味道。

再说夏衍对于人的超越精神的强调。夏衍笔下的人物总是在动态的社会环境中不断发展变化的。他以人道主义的眼光揭示出人物主体的生存困境,也以实践家的气魄希望人们在社会生活矛盾中寻找解决困境的办法。在他那些成功的作品中,不但主人公,就连次要人物也各有鲜明的心路转轨历程。像《法西斯细菌》中的赵安涛、静子等就是如此,从中可以看出夏衍的一个基本观点:虽然小人物的生活是孤苦的,是值得同情的,他们种种不振的生活状态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人们对他们应当同情多于谴责,但这决不是说人们应当赞同这种生活。恰恰相反,每个人,即便是最底层的人,也有责任和义务从人的自我实践出发,尽快摆脱这种令人不快的精神困境,为自己,为家人,也为社会重塑一个更令人愉快的环境。可以这么说,这些小人物的灰色生活诚由社会所造成,但如若安于这种现状,并认为这就是生活本身,那就是他个人的抉择——一个应被彻底贬否的抉择了。因而,从匡复、林志成、杨彩玉、刘爱庐、刘绣笙、赵婉、林孟平、梅漪、俞实夫、赵安涛、静子,到尚志恢、孟小云、许乃辰,直到丁纬、杨仲安,夏衍正是通过一个个活的个体在各自不同的环境条件下,通过主体的努力和自我超越改变了原来的生存面貌,在奋斗中实现并且达到了生活的充实和愉悦。

今天我们谈论夏衍的人文关怀意识还有另一层用意。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文学应当描写复杂的人性这个观念已深入人心。不少作家因此怀着深切的同情去描绘一些原来久被人遗忘的边缘人物与边缘感情,为他们的不幸而感动流泪,这本来都是值得嘉许的。但也有不少作家能入其内而不能出其外,在作品中老是宣扬灰色格调,以为人们停留在自怨自艾甚至自虐的情状中才值得称道。对于人们的挣扎、痛苦、无奈,他们常常抱着猎奇的心态在一旁拍手叫好,如若有人奋发自立,超越自我,他们反感到索然无味。这些现象委实让人困惑不解。因而,在中国当前文坛提倡用实践的观点来看待人的活动,从动态中描写人不断求真的心路轨迹,像夏衍那样,从善的、美的一面来体现人的生存意义,不无现实参照意义。巴金在吊夏衍的唁电中说:“夏公是20世纪的同龄人,20世纪即将过去,夏公的精神长留人间。”愿笔者所论的夏衍的人文关怀,成为他长留人间精神的一个小小脚注。

[参 考 文 献]

- [1] 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M].北京:三联书店,1997.237.
- [2] 夏衍.于伶小说[A].夏衍.夏衍杂文随笔集[C].北京:三联书店,1980.79-86.
- [3] 夏衍.走过来的道路[A].夏衍.夏衍杂文随笔集[C].北京:三联书店,1980.564-571.
- [4] 夏衍.夏衍剧作集(一)[Z].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210,219,234.
- [5] 夏衍.夏衍剧作集(二)[Z].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216,188,435,447.
- [6] 刘西渭.上海屋檐下[A].夏衍.夏衍研究资料[Z].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501-525.
- [7]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A].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Z].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75-115.
-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27.
- [9] 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惟科学主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251.
- [10] 张西平.历史哲学的重建[M].北京:三联书店,1997.186,189.